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当代哲学问题

九讲

陈家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当代哲学问题

九讲

陈家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哲学问题九讲/陈家琪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301 - 24419 - 7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现代哲学 - 研究 IV. ①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7495 号

书 名: 当代哲学问题九讲

著作责任者: 陈家琪 著

组 稿: 杨书澜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4419 - 7/B · 12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54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讲	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	(1)
第二讲	政治哲学为何会成为当代显学?	(23)
第三讲	世纪的思想情绪及 20 世纪的主导逻辑	(45)
第四讲	现代性反思与时代的拐点	(75)
第五讲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	(97)
第六讲	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上)	(128)
第七讲	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下)	(149)
第八课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上)	(166)
第九课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下)	(188)
后记		(213)

第一讲 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

这一学期这门课,一共有九次,总的题目叫当代哲学问题。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下一次讲为什么政治哲学在今天会成为一门显学,第三次是 20 世纪的思想情绪,即 20 世纪的主导逻辑到底是什么,第四次想讲一下对现代性的反思,也就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问题,第五次,讲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历史的方向性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讲一下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问题。第六次讲信任问题,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这恐怕是一个很尖锐、很突出的问题,因为它与社会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有关。这个问题恐怕要分两次讲完。如可能,再讲讲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很麻烦,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随着民主、法治的推进,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或者说如何让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很困难的理论问题。至于实践上的困难当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许多文章,比如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还有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关系及希腊化时的罗马帝

国问题,等等,等于是重新认识西方哲学。最后想讲一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我大概就想到这些个题目,它们都是我在各地多次做学术报告时讲过的话题,有的写成了文章,有的没写,我很想系统地把它们讲一次,现在有这样一次全程录像的机会,就再系统讲一次。也许有些问题没讲完,两节课的时间就到了,也许讲完了时间还没到,这个要讲着看。上过我课的人,有些是博士生,有些是本科生,都知道我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总在反思中推进,常常由一个问题引起一连串的想法,当然它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我可能会按照我的性子讲下去,到底会怎么样,讲到哪里,我现在还不好说,大概话题就是这么多,而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研究生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讲的就是哲学界最时尚的、最热门的问题;从空间的角度来说,就是学者群体目前最深入、最深刻、最集中、最尖锐的讨论所围绕的问题。但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哲学本来就是一种孤独者的事业,一种真正属于“思想者”个人的思想,它一旦成为人们的公共话题,也就等于宣告了哲学的死亡。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与时尚、热门是格格不入的,想追求时尚、热门话题的人就不要讲哲学。电台、电视台不是没有讲过哲学,比如有一本书,英国人麦基(B. Magee)编的《思想者》,就是让一些哲学家在电视(BBC)上讲哲学,从1975年到1978年,当然邀请的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就非常成功。但我依旧不知道收视率怎么样。电视台一旦把收视率列为一项指标,那哲学就讲不成了,至少不可能在我们的“百家讲坛”上获得成功。“百家讲坛”也邀请过我,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我所讲的东西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我们国家的学术界,现在分歧很大,争论很大、很

多,再不会像上世纪 80 年代我刚刚步入学术界时候的那种状况了。那么现在大家争来争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分歧点到底在哪里,我准备谈谈我的看法。再一个就是热门话题和时代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哲学的前沿问题一定与时代中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有关。但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纠缠着自己的最大、最根本的问题;自己所想的是什么跟时代的前沿问题可能不一样。我主要着眼的还是我自己所想的问题,自己最近读书中所想到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开讲之前,还是说一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讲过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理性了,有时也人云亦云,大家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因为这就是最热门、最时尚的话题。别人怎么化妆,我就怎么化妆,别人说什么是美,我就说什么是美。进一步说,天真心灵是遵照传统,遵照习俗,遵照公共意见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跟它相反的就是一种认真态度。关于“认真态度”的翻译,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中文里“认真”是一个褒义词,但用在此处的“认真”,英文翻译成 *perplexity*,就是指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其实事情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都看得很清楚了,然后有一些人出来,以认真的态度讲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这种认真态度认为,只有背离了公众的常识理性,背离了人云亦云的那些东西,自己独创出一些东西,才说明自己是认真思考的。我所说的必须是现在最新的、别人都没有说过的话,是别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黑格尔在这句话后面拉了一个杠——现在是永远继续着的。也就是说,所谓现在,并不全然是最新的,而是延续着的过去,不断成为过去的现在。这种认真态

度是与天真心灵恰好对立的,比如说中国模式,人们如果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是全新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传统里有过,就是其他国家曾有过,要不就是我们把某些过去的东西糅合在一起,重新加工了一下而已。总而言之,不可能有什么全新的东西,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创造不出全新的东西了。我从现在起讲到的所有话题,也就是一共要讲的九个话题,都不是我自己独创的,而是其他哲学家早就认真讨论过的。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话变成了自己的话,把他们很复杂的理论话语尽量口语化,再加上一些个人的感受、看法、评述,等等。

我还是想先谈谈黑格尔到底是怎么理解哲学问题的,这和我个人的专业兴趣,和我熟悉的程度有关。我们知道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里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我们几乎毫不怀疑这一点;但黑格尔为什么说哲学就是时代,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自己的时代? 请注意:第一,它不是反映论,它告诉我们,不是时代是什么样子,就会反映在你的脑海中,它需要你自己去把握。“把握”,也就是领会、了解、理解(*comprehended*)的意思。第二,时代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你主观臆想的,不是你完全空想出来的,它是你对时代的把握,而时代是在那里存在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认为这是每一个天真心灵都会认可的信念,就是说:时代在那里存在着,总有它存在的理由(道理);这就如自然界本身的存在一定有其合理性一样。所以哲学(科学)不是要把自然界变得合理,而是要让其本来就有的合理性获得一种合理的形式,即被人的理性所把握。把本来合理的内容(这纯粹

只是一种信念,或者理解为假设)变成合理的形式就是思想上的把握。在这一意义上,把握也就是一个思想的重新建构(赋予形式)的问题。什么是哲学的事业?哲学的事业就是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内容(但从整体上看一定是合理的)在形式上合理化。这种话说起来还是很抽象,我们再具体一点:形式化就是合逻辑地讲出一番道理,而道理,就集中在概念间的关系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多次涉及,因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时代在思想中被重新建构(赋形),就成了时代的哲学问题。在黑格尔的时代,或者说对黑格尔来说,他相信这样被重新建构(赋形)的时代(也就是哲学)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致的。这种普遍性的根基在历史,历史的方向性与合规律性。当然,我们今天对这一点已经不怎么相信了。所以我们也认为时代(哲学)的前沿问题并不一致;哪怕时代或者哲学是一致的,对前沿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不一致。或者说,谁都生活在他的时代,生活在他的当下;如果大家面对的问题并不一样,也就是内容上不同,那么论述其合理性的逻辑也就很可能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就无所谓什么哲学的前沿问题,任何问题,你所关注的问题,对你来说,因为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是哲学的前沿问题,并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哲学前沿问题。现在有个古典热,人们想去探究古代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或思考问题的方式,如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孟老庄佛,这些问题于是也就成了时代(哲学)的前沿问题;并不会因为它们是古典的,就不能成其为前沿问题。时代怎么会被你把握在思想中呢,第一你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第二呢,你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哲学研

究的是理念,理念是概念(框架)及其现实化(内容)。如果没有概念,这个时代对你来说就很庞杂,也谈不上把握,更无法成为被你把握在思想中的哲学问题。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都可以用一个或几个基本的概念进行把握。在欧洲,比如自16世纪以来,我们就可以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世俗化、所有权、革命、工业革命、民主、平等、宪政、技术化、现代性等等概念进行把握;这些概念对于百年中国来说等于重演一遍;当然,把“世俗化”改为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也许更合适,因为我们没有或者缺少宗教统治或政教合一的阶段,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的政教合一是全新的另一种形式,比如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统治方式,还有市场经济与权贵阶级的形成这样一些概念,大约也是时代的话题。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几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哲学的前沿问题就是在寻找这样的核心概念。当然,每个人找到的或认为的核心概念并不一致,论证方式也不一致,而且,这样的核心概念与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马尔克斯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时代并不在于你当下过得怎样,而在于你回忆起它的时候会怎么回忆它,怎样复述它。我老在想,过去的哪一个时代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而现在的想法和当时的想法会完全不一样。我真地想说,农村插队的时候是我这几十年中最好的一段岁月;那时过的是极其贫穷的生活,一天只吃一顿饭,大家很多都是从农村来的,也许不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出我们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而今天回忆起来,却是我最有感觉的一段岁月,因为有信念,活得充实。问题在于必须把这种感受变成一个理论问题,找到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比如是什么样的信念,而且在时代的概念关系中确立它的位置。如果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

它的时代的话,那么我们把话反过来讲,在座的诸位正在经历的大学生时代、研究生时代,可能现在会有许多的烦恼、焦虑,但若若干年后,当你回忆起现在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大学生活,或者研究生生活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也就是说,就业、婚姻、子女教育、医保、住房,当然还有我们要讲到的信任、民族问题、母语的危机等概念还没有成为纠缠着你的核心概念。但问题不在于你怎样,而在于你想怎样回忆它,在于你怎样合逻辑地把它叙述出来。如果你从事的是哲学工作,那就要有论证,概念的论证。在论证中,“是”(being)就成为了“应是”(becoming)。

说到概念框架,这是我们哲学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查尔斯·泰勒写过一本书,《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一章题目就叫“无法逃避的框架”。任何一个人都有一系列无法逃避的框架,都生活在一系列的概念的框架当中。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把经验,把现象勾画出来,没有办法认同,没有办法理解。现在支配你的最基本的几个概念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命令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应该盗窃,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尊严是什么意思,我们又为什么渴望爱情,渴望自由?这些概念就变得跟我们的本能一样,一种你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总在支配着你的东西。比如我们有些人喜欢吃甜的东西,有些人有恐高症;当我从这十一楼往下看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被诱惑着想往下跳的感觉。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概念的框架涉及我们对人的本性的一种本体论的理解。什么是对与错,应不应该尊重生命,要不要有礼貌,凡是涉及到人应该做什么,人渴望做什么的时候,都是与我们对人性的根本的看法相关,而如何理解人性又和所有的这些概念的框架有关,正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才能理解、描述现

象。什么是历史,哪一个事件可以进入历史,这些事件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支配你的概念框架;这种框架哪怕是实验性的、模糊的、犹豫不决的,但是只要你有一种感觉,觉得这可能不错,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不敢肯定这些概念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对于民主、平等、自由、选举、言论公开那些概念;可我们心里至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些。这其实是蕴含着一种实验性的想象能力。海德格尔说,可能性是高于现实性的。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有三类,第一是生命:最简单地讲,我们都要尊重生命。这里就牵扯到好多的问题了;战争是生命的屠杀,如果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么一定是反战的;还有一个,就是安乐死的问题。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了一个片子,有两个人被判刑,都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得了不治之症,痛不欲生,为了结束病人的苦痛,这几个人亲手杀死他们,有的是把导管拔掉,有的是直接把人捂死。一个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另一个被判刑五年,缓刑五年;实际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进牢房,可他们仍然是被定为故意杀人罪。生命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但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公共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个人的生命是第二位的。那时候生命没有被看得这么重,歌颂的英雄人物中也没有谁是因为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而值得歌颂,这说明我们以前接受的是另一种概念框架。第二个概念就是自由:自由当然是很抽象的概念,而这里说的自由就是权利,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平等,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不是说谁在哪一方面有特殊的自由。比如把人区分开来,哪里你不能去,什么事你不能做,而别人都能,实际上就在平等上大折扣了。和自由有关的一个概念是尊重人格,即尊重自律;如果

不是自由的,就谈不上自律。康德反复讲的道德绝对命令就是一个自律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自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决定,没有办法做决定,说明你没有自律的能力,那么就一定是他律的,就是说你在服从一个外在的规定。第三个有分歧,有人说是尊严,有人说是幸福:尊严这个词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人要活得有尊严,但尊严是什么?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吗?是,又不是,看你怎么理解了。现在小学生学习负担很重,无法玩耍,我们找了各种原因,也用各种办法来改变它,其实背后就有一个尊严问题,因为我们有了社会分工,但人与人之间却没有平等感,所以总怕被人看不起才从小抓起,让孩子们拼命读书。平等与幸福,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简单地说,幸福指的是一种生活的完整性;我们很明确地知道了有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我们所想要的,因为它比另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要好一些,因为它带给我更多的快乐,更多心灵的安宁,更少恐惧感。它是一个可选择性的,涉及一个对整体性的理解;整体性就是指我要这个,但必然连带着好多东西,我喜欢金钱,金钱会带来很多好处,但同时也会带来无尽的烦恼;我喜欢安宁,当然不仅是安宁本身,还包括安宁的其他的益处,当然也包括寂寞与孤独。所以,查尔斯·泰勒认为,生命、自由、尊严、幸福,都是生活当中离不了的、逃不开的最基本概念框架。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框架,人就会陷入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当中,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聊、很空虚。发现意义,就是构建表达,或者说发现生活的意义就是要你发现一种你可以凭仗的有意义的表达;反过来说,你在什么事情上找到了意义,取决于你是否找到了有意义的表达,如果你没有找到有意义的表达,这个意义不能被人领会,也不能变成你个人的体会。很多东西是在你把它变成表达后,才能反过来成为你个人的体会,或者至少我们在

表达中加深了个人的体会。真正的生活的意义在于,你发现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而这个表达的方式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写了很长的东西,我们一看,都是空话,我觉得这没有意义;那么生活就是很空虚的,很苍白的,或者说是很抽象的。

今天是9月15号,之前的这些天都是有重大意义的。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10号是教师节,11号“9·11事件”,12号中秋节,13号是林彪事件,从9月9号到13号只差四天。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可以说中国命运的转折和变化就发生在这四五天当中,我把它压缩了一下,说成五天,实际上中间隔了五年。我们这一代人的悔悟和觉醒是与林彪事件密不可分的;没有林彪事件,我们还生活在热火朝天的革命热情当中,而林彪事件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真正知道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因为他最亲密的战友、被写入党章的这么一个接班人竟然要杀害他,还公布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是喊破了嗓子的万寿无疆,一个是喊破了喉咙的永远健康。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在北京,就这两句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喊了整整一夜,从白天晚上8点一直喊到第二天10点。有一个大字报说医学权威们已经证明了毛能活150岁,林副主席能活120岁,我当时就赶快把它抄下来,寄给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立马张贴出来;可一贴出来,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说毛主席万寿无疆,你还说毛主席只能活150岁,接下来就开始辩论,到底是万寿无疆,还是能活150岁。我们万万没想到毛1976年去世了,说明他真是人,不是神。你们想象不出过去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这几个日子对我们多么重要。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第一次,1976年毛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是第二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

个现象,这两个日子,在今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鸦雀无声,没有人对毛 35 年前去世、林 40 年前去世的这两个日子说一个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集体失语,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过去 35 年、40 年最重大的两件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种状态是怎么造成的?这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种很悲哀的状态,我们想说的话太多了,但是大家都不会去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9 月 12 号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我过得很奇特,一位医生朋友开着车拉我们去了浦东的滨江森林公园,就在黄浦江的人海口,很空旷,很开阔,也没有什么。我们就坐在草地上等着月亮升起,而我一直在想月亮究竟会从哪边升起,一个活了六十多岁的人竟然不知道月亮是从哪边升起来的;我那位朋友就用手机百度了一下,结果百度告诉他,太阳从哪边升起,月亮就从哪边升起。这个回答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难道月亮是从东边升起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人没有方向感,你要问我这房间里哪边是南,哪边是东,我是分不清楚的。等着,等着,月亮真地就从东边慢慢升起来了,由白渐渐变红;很多人为了去泰山、华山、黄山看日出都挤破了脑壳,而这月亮的初升比起日出恐怕还要胜出几分。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坐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等月亮升起,唤起了我儿时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时,一到中秋之夜,我们会在院子的空旷处摆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满了水果、月饼,然后全家人一起望着夜空,等着月亮出来,就像拜月一样。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月亮崇拜,也可以理解为阴性崇拜,这好像与历史的现实完全不符。我不知道。9 月 10 号是教师节,这是国家法律指定的一个节日,不是传统延续下来的,所以它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教师、知识分子的某种尊重;但是,在学生心里的印象也就是个普通的假日;对我

们而言,也不过多了几盒学校发放的礼品。我们再想想,9月9号、9月10号、9月11号、9月12号、9月13号,这五天真的是不寻常的五天,它们背后有多么曲折的历史,对我们又有多少重大的影响。这几天,我们就这样过去了。我想知道,你们,特别是新生们,是怎么过这几天的?都干了些什么?

“9·11”是个特别重大的日子,十年前的这一天纽约市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在那之后我们政治语汇其中的一个核心词就是恐怖主义。因此有必要专门谈一下什么是我所理解的恐怖主义。刚好9月11号那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几个专家谈恐怖主义,他们说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难下定义的概念,现在都知道要反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反恐,中国也反恐,但各自理解的恐怖主义的概念其实相去甚远。当时有位专家讲,有三点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一,恐怖主义是有政治目的的;第二是暴力手段;第三是殃及平民,也即殃及无辜。我当时就想,哪一次战争没有政治目的,哪一次战争不是使用暴力手段,哪一次战争不殃及无辜。难道打一次仗,光打对方的将军与士兵?战争可是要攻城拔寨的,怎么能不殃及无辜?也就是说,我对他的这个理解并不满意。那么我从哪个角度去想恐怖主义的问题呢?我要提供的思考角度来自于卡尔·施米特1963年所写的《游击队理论》。卡尔·施米特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说的很多话都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话如出一辙,比如对游击队的问题,对政治就是区分敌我的问题,甚至星星之火可不可以燎原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他曾被确定为纳粹德国的官方法学家,特别是国际法专家,盟军就禁止他上讲台。后来,他就住在他的乡村里,而且活了很长,一直到九十多岁才死;期间他写了很多书,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游击队理论》这本书

翻译出来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与《敌后武工队》,小说《红旗谱》等。这些书是我们那个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也最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了。荡漾在微山湖上,听着那首动人的歌,简直美极了。难得的是卡尔·施米特把游击队这种战争形式变成了一个高度理论化了的对时代特征的认识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的问题。“9·11”事件中凸显出的恐怖主义问题其实也在他的理论视域之中。那么什么是卡尔·施米特所理解的“游击队”?笼统地说,游击队是与土匪不同的,因为这些人应该有信念、有政治目的。它不是因为活不下去,因为没饭吃而被逼得揭竿起义的一帮人,到发现官军其实不堪一击,然后才萌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模糊想法。当然都是换汤不换药,换一个人去当皇上而已;所以游击队与梁山泊上的一百单八将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谓的“替天行道”只能算是介乎政治信念与土匪们模糊想法之间的一种东西,主要还是想均贫富,说是反对以富凌弱,其实是要把“富”据为己有。像黑旋风李逵、阮氏兄弟他们这些人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下层,不受尊重,好像还没有涉及到温饱问题。《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其实只有一个人是农民(九尾龟陶宗旺),因此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游走在江湖上的以社会流窜分子为主体的流民阶层。这些人是一切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杀人放火的行为主体。卡尔·施米特认为游击队有这么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不分平民和战士,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全民皆兵。如果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平民和战士是不加区分的,那么它所遵循的就是卡尔·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比如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一入学就全部接受军训,但目的恐怕还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但是否真有这样的效果我